



# 民商事诉讼实务前沿

2025年6月刊

上海市律师协会  
民商事诉讼业务研究委员会  
编委会

王正 关峰 彭筱剑 施磊  
莘欣 周郁婕 裔沁玮 肖文婷  
薛娟 谭勇 叶枫 顾巍巍  
赵国庆 王屹东 白翔飞 金艳韬  
王彦 沙兆华 周云涛 沈悦

# 目 录

## • 新规速递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印发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的通知..... 3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对海事法院法律监督机制的通知..... 6
- 法答网精选问答（第二十一批）——人民陪审专题.....8

## • 业务动态

- 域外证据审查认定常见问题与实务要点 | 衡石·涉外..... 11
- 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案件审理思路探讨..... 17

## • 实务研究

- 对网络刷量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认定.....26
- 最高检抗诉！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再审案获改判.....32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印发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的通知

来源：北大法宝

发布时间：2025年5月28日 实施日期：2025年7月14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pkulaw.com/chl/ec3b96ffd9e842ecbdfb.html?way=listView>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印发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的通知 (法〔2025〕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律师协会，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律师协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便利群众诉讼，以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24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了《部分案件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试行）》（法〔2024〕46号）。

一年多来，经过积极宣传推广和引导，广大律师、当事人通过实际使用对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有利先行调解和促进审判提质增效等方面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同；同时，广大律师、当事人、专家学者、基层法院法官针对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增强使用便利性、提高应用实效性意见建议。

据此，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充分了解吸收各方意见，对示范文本的要素类别、内容、格式等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比如，根据立案工作实际，统一完善起诉状答辩状“当事人信息”要素类别，删除“送达地址”、“电子送达”栏目，优化表格设计、调整字体大小，让当事人看得明白、用得方便，减轻当事人填写负担；在“诉讼请求”、“答辩事项”、“事实与理由”项下增加空白栏，方便当事人根据需要对案情进行表述或补充其他信息，全面充分表达诉求；针对专业性较强、不易理解的法律专业术语，增加相应解释和填写说明；从已审结案件中筛选有代表性、复杂程度适中案件的起诉状答辩状作为实例，方便当事人加深理解和参考借鉴；在“证据清单”中，根据实际案由提供部分证据指引，方便当事人提交对应证据，提高诉讼效率；增加“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意愿”栏目并详细阐释先行调解的流程、优势等，为当事人选择先行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提供指引、服务，也方便法院充分了解当事人调解意愿，适时开展调解工作，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第一批11类试行示范文本进行修改完善的同时，又针对刑事（自诉）、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海事、行政、环境资源、国家赔偿、执行等9个领域常见多发诉讼案件研究制定了56类新的示范文本，现将两批67类示范文本合并印发，自2025年7月14日起全面推广使用。2024年3月4日印发的《部分案件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试行）》（法〔2024〕46号）同时废止。现就示范文本推广应用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识要素式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的重要意义。制作起诉状、答辩状是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实现庭审优质化的前端要件，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诉讼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关系到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质量和效率。此次发布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采用表格化、要素式方式，旨在让人民群众看得明白、用得方便，为当事人起诉、答辩提供规范全面的诉讼指引，是人民法院立足群众司法需求，便利群众诉讼、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为民举措。各级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凝聚工作合力，通过深入细致地宣传、解读、培训、释明等工作，积极指导引导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使用统一规范、要素式、勾选式的示范文本，让人民群众全面、准确表达诉求，快速确定争议焦点，提升对诉讼结果的合理预期，促推纠纷实质化解、高效化解、一次性化解，做实定分更重止争工作，携手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便利人民群众诉讼的工作理念。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积极引导、尊重选择”的总体原则，结合工作实际，积极稳妥推进，做足做好示范文本在立案、审判、执行以及先行调解各环节中的引导服务工作。在诉讼服务中心配齐配足诉讼服务人员，引入要素识别回填等智能辅助工具，广泛邀请律师、调解员、法学专业志愿者等社会第三方参与引导服务工作，逐步实现当事人、律师对示范文本的进一步认可。要坚持示范文本推广应用与参与综治中心建设、加强先行调解一体落实，统筹做好综治中心问询、示范文本引导、先行调解告知工作，在指导填写示范文本的同时，详细释明先行调解省时、节费、促和等有利双方的优势，增强纠纷实质化解效能。要加强示范文本在调解、审理环节全面应用工作，加强业务培训，进一步压实法官应用示范文本开展庭审工作，实现纠纷化解早、群众认可度高。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尊重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意愿，坚决防止违规以强制应用示范文本为由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有案不立，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对有案不立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三、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提升示范文本好用、易用、管用水平。各级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示范文本施行过程中注意收集、梳理、总结示范文本推广应用中发现的不足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满意度评价系统就示范文本设计、应用反映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广泛听取意见，认真研究回应，商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示范文本及时进行动态优化完善，持续提升示范文本好用、易用、管用水平，更好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司法审判过程中，推动司法审判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25年5月28日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对海事法院法律监督机制的通知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发布时间：2025-06-08 14:41:25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67181.html>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完善对海事法院法律监督机制的通知 高检发办字〔2025〕1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海事法院是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为完善对海事法院的法律监督机制，确定下列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对海事法院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办理相关案件中依法向海事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开展法律监督。

大连海事法院接受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青岛海事法院接受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南京海事法院接受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宁波海事法院接受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厦门海事法院接受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北海海事法院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海口海事法院接受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法律监督；  
上海海事法院接受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法律监督；  
天津海事法院接受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法律监督；  
广州海事法院接受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法律监督；  
武汉海事法院接受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汉铁路运输分院法律监督。

需要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作出调整的，由海事法院所在地省级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听取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意见后，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相关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海事检察工作的业务指导，加强专业化办案组织建设，引进、培养和配备专业人员力量，牵头建立健全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相关人民检察院办理对海事法院监督案件涉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辖区的，其他人民检察院要给予支持配合。各海事法院要健全完善接受监督机制，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人民检察院做好沟通协调，协同建立信息共享、案情通报、同堂培训等工作机制，落实调阅案卷等工作规定，形成海事审判、检察工作合力。

各地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重大问题，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6月6日



### 法答网精选问答（第二十一批）——人民陪审员专题

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25-05-29 08:35:30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66371.html>

#### 问题1：人民陪审员能否参加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发回重审、再审案件？

##### 答疑意见：

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从立法意图来看，人民陪审员法中规定的“第一审”指的是“第一审程序”，而并非“初次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百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等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而言之，发回重审案件的合议庭与第一审合议庭的组成方式相同，既可以由法官组成，也可以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但是合议庭组成人员不能与原审相同，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而对于再审案件的审判组织，原来是第一审的，也应当按照原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需要注意的是，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发回重审、再审案件是否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应当依照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关于“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案情复杂”等规定，结合具体案件情况综合判断，确保人民陪审员充分发挥熟悉社情民意、长于事实认定的实质参审作用，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同时，发回重审、再审的案件情况比较复杂，对于有些不宜由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应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

咨询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办公室 段春山

答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部 张磊



**问题2：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合议庭应如何组成？****答疑意见：**

依照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由四名人民陪审员和三名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审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由检察机关在刑事公诉过程中附带提起，与单独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有所区别，故在审判程序、审判组织上应适用刑事案件审判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明确，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否应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应当以刑事案件是否符合“社会影响重大”的标准进行判断，属于人民法院依法依职权决定的内容。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相对较轻的第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依法组成三人合议庭审理。

咨询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王雄英

答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部 张磊

**问题3：人民陪审员作为一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在其任职法院参与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相关案件是否应当提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答疑意见：**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等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关于何为“特殊原因”，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作具体规定，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1）出现因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不可抗力；（2）全体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需要回避。

我们认为，人民陪审员作为一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在其任职法院参与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案件是否应当提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以及人民陪审员个人情况，综合判断该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是否会导致所在法院的全体审判人员与本案产生利害关系，进而需要整体回避。对于足以导致所在法院全体审判人员与本案产生利害关系需要整体回避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确保案件公正审理。相关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准确适用指定管辖与回避制度，依法告知另一方当事人相关情况，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申请回避的权利。

咨询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教育管理处 俞琳祯

答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部 吴君媛

#### **问题4：任期届满的人民陪审员能否继续参加未审结案件的审理？**

##### **答疑意见：**

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参照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前任期届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更换，重新开庭审理；合议庭已评议但案件尚未宣判时，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的，可以继续履行审判职责到案件审结之日。实践中，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职务自动免除，人民法院不得随机抽取任期已届满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人民法院在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审时，应当综合考虑人民陪审员剩余任期、案件审理周期等因素，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科学设置随机抽取条件，合理确定合议庭人员组成，确保案件审理工作有序进行。

咨询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政治部 武沛

答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部 吴君媛

## 域外证据审查认定常见问题与实务要点 | 衡石·涉外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6月5日 15:25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PVjcJNVNa63Qv6tRip0SSg>

在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域外证据的审查与认定是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环节，也是相关从业人员时常面临挑战的领域。今天，我们就从几类常见问题入手，**梳理总结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域外证据认定的基本方法和审查要点**，以期对法律同仁的实务工作有所助益。

### 一、域外证据的界定--什么是域外证据？

**问题一：一份邮件从外国服务器发出，但收件人在中国接收，它算“域外证据”吗？**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域外证据通常指形成或者存在于我国境外或者管辖法院所在法域之外的证据，包括外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形成的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但关键问题在于——“形成”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最终形成说”（主流观点）：**以证据最终固定时的所在地为准。例如，一份合同在外国签署，但扫描后通过邮件发送至中国，其电子版存储在中国服务器上，可能不被认定为域外证据。

**“部分形成说”：**如果证据的关键部分（如签署、制作）在境外完成，仍可能被认定为域外证据。例如，某外国公司在中国打印合同，但由外国总部盖章后寄回，仍可能被视为域外证据。

**总的来说，对于证据的形成过程和最终形成地均在境外的证据，属于域外证据。**对于形成过程同时涉及境内和境外，最终形成地在境内的证据，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在判断域外证据时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总体更倾向于以最终形成地是否在境外为基本原则。

如对于电子数据（如往来电子邮件、Whats App聊天记录），需结合服务器位置、数据存储地、原始载体提交方所在地综合判断。**对于跨境交易文件（如国际贸易合同），若双方均在中国境内签署，即使涉及境外履行，通常不视为域外证据。**

## 二、域外证据的形式审查-哪些证据必须“持证上岗”？

### 问题二：当事人提交了一份外国公司的股东名册，但未公证认证，法官能直接采信吗？

由于对域外证据的真伪判断较域内证据存在更多困难，为了加强域外证据举证的真实性的核查，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对域外证据进行公证、认证，便于法院甄别相关证据的真伪。相关规定最早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域外证据的态度是“全部要求公证认证”。这一规定给涉外民商事诉讼的当事人带来较大的负担，也影响了相关案件的审理效率。为回应争议，顺应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需要，最高院改变了原来“一刀切”的审查要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则》）第16条，并非所有域外证据都需要公证认证，而是分类处理。此后，在最高院2021年《全国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又对上述第16条规定进行了两方面的补充和解释。结合2023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5条的规定，我国法律关于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的要求可以归纳如下：

#### 第一大类：与当事人身份有关的证据

涉及当事人主体资格材料及身份关系的材料，以及境外当事人从我国领域外提交的参加诉讼的授权委托书必须公证+认证。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能在中国参加诉讼的外国自然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交护照、出入境证明等证件证明身份，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于外国企业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注册登记信息、授权代表人的董事会决议等文件）需要公证、认证或履行我国与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相关证明手续；另，在我国境内形成的授权委托书可以由我国公证机构公证或在人民法院法官的见证下签署授权委托书。

#### 第二大类：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

① **公文书证（如外国法院判决、政府登记文件）**，一般认为，如果是国家职能部门根据公务职权所制作的书面文件，应属于公文书证，如结婚证、离婚证、国籍证书、营业执照、裁判文书等；公文书证通常无需领事认证；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公文书证或可通过互联网核查真实性的公文书证可免于公证。

② **私文书证（如合同、邮件、商业票据）**，可由当事人选择是否公证，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要求。

### 三、公证认证怎么做？ - “双认证” 还是 “单认证” ？

**问题三：当事人提交了一份外国公证处的文件，但未经中国驻该国使馆认证，能采信吗？**

我国加入了《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后，对域外公文书证的认证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公约成员国内取消了领事认证，由文书来源国的主管机关对文件签发附加证明书（APOSTILLE，即海牙认证）的方式完成相关文件的证明手续。不过，我国港澳台地区不适用公约。所以，在判断证据是否需要“双认证”时，应通过识别证据的来源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处理。

#### **一般国家：公证+认证（“双认证”）**

- ① 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
- ② 所在国外交部或授权机构认证。
- ③ 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步骤针对的是在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不属于海牙公约成员国的国家形成证据的公、认证手续。如域外证据所在国与我国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该证据须先提交至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办理认证手续，再将该证据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进行认证。

#### **海牙公约成员国：只需“附加证明书”（Apostille）**

2023年11月7日起，《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对于公约成员国，只需办理附加证明书，即海牙认证，无需使领馆认证。

### 国际条约规定优先

如我国与所在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条约规定了具体的证明手续，相关证据的公证、认证手续应依据相关条约的具体规定进行处理。例如，我国与俄罗斯订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二十九条规定，“缔约一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书，只要经过签署和正式盖章即为有效，就可在缔约另一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使用，无需认证。在缔约一方境内制作的官方文件，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也有同类官方文件的证明效力。”

### 港澳台地区特殊规则

**香港特别行政区：**需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相关名单和信息可登录司法部网站或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有限公司查询：<http://www.caoao.org.hk/>），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核验并转递。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流程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书的核验、转递机构为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

**台湾地区：**需经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公证，公证事项如果属于两岸商定的14项应寄送公证书副本范围内的，人民法院应将当事人提交的公证书正本与本省(市、区)公证员协会收到的台湾海基会寄送的副本进行比对，相互认证后即可确认其真实性；如公证事项不属于两岸商定的14项应寄送公证书副本范围内的，人民法院可请求本省(市、区)的公证员协会通过台湾海基会进行查证。

### 可免于公证的几种情形

**当事人达成互免公证的合意：**在双方均有域外证据需办理公证等证明手续时，可引导当事人达成互免公证等证明手续的合意，以减少程序繁琐和费用负担，提高诉讼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达成互免公证等证明手续合意后，不影响一方当事人以其他理由对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互免公证等证明手续的合意仅在达成一致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不得对抗其他利害关系人。



**特定情形下公证手续的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根据商事活动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够初步判断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存在较高可能性的，可不要求对相关域外证据办理公证等证明手续：

- ① 目的国或地区因战争、武装冲突或类似事件，确定无法在正常期限内进行办理或期限届满后仍无法完成办理的；
- ② 对方当事人可以以更为经济、方便的方式提出反证，经法院释明后仍然拒不提供的；
- ③ 办理公证等证明手续的费用明显高于或接近当事人争议标的价值，但经法院释明后，当事人同意由败诉方承担公证等证明手续费用的除外。

#### 四、域外证据的实质审查--双证加持（公证+认证）的证据一定是真的吗？

**问题四：当事人提交了一份“经过公证”的境外合同，但对方质疑合同落款公章是伪造的，法官该怎么办？**

即使域外证据经过公证认证，法院仍需依法进行实质审查，不能仅因手续齐全就当然采信。**审查要点和原则包括：**

#### 重视质证环节的关键作用

质证环节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关键作用。通过当事人对证据的充分质证，可以揭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简单以证据未经公证、认证为由不予质证。法院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异议，并对异议进行细致、全面的审查。

#### 正确把握办理公证等证明手续与域外证据采信之间的关系

对域外形成的不涉及身份关系的非公文书证，不因未办理公证等证明手续而绝对不予采信；对经公证等证明的域外证据，不因办理过公证等证明手续而当然予以采信。



#### 综合判断相关证明手续的必要性

根据当事人对域外证据先行发表的实质性质证意见，足以对其证据效力或证明力得出否定结论的，该域外证据尚未办理公证等证明手续不影响案件审理进程和作出裁判。

#### 尊重不同国家、地区习惯和差异

应注意尊重不同国家、地区在经济交往、商事活动、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全面分析，避免因相关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发票）或内容表达方式（如仅签字无盖章）与域内证据不同而简单否定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 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案件审理思路探讨

来源：上海高院 发布时间：2025年03月17日 09:02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9ejSdWE5EbS6-lyNKZioew>

执行程序中，在债务人公司不能清偿执行依据所确定债务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往往会申请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而执行机构在强制执行时，需最大限度尊重执行依据中关于被执行人的记载，非依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追加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主要有五个条文（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就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作出规定，并明确异议前置加执行异议之诉的救济程序（第三十二条）。本文针对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案件的常见争议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 01 基本原则：追加事由法定

❖ **案例1**：执行依据判令甲公司支付乙公司3700余万元。执行机构扣划甲公司银行存款630万元后，因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乙公司向法院申请追加甲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为被执行人，对甲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驳回申请后，乙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主要理由是李某在甲、乙两公司合作过程中，涉嫌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决策过程，使公司丧失独立性。

#### 一、能否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申请追加被执行人

《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有关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知，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必须符合法定原则**。

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不同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主张股东承担责任的普通民商事案件。两者在审理对象、审理范围、审理程序、法律依据和裁判主文等方面均不相同，应加以区分。

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程序涉及生效裁判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应遵循事由法定原则。在请求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中，裁判依据首先应当是《变更追加规定》规定的五种情形，其次才是《公司法》及相关解释中的相应规定。**对不属于《变更追加规定》中所列明可以追加的法定情形**，如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当事人仅依照《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申请变更追加的，一般不予支持。**

## 二、裁判依据的援引

在裁判依据援引方面，**应首先援引《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再援引《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等。**比如，申请执行人请求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裁判文书应援引《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作出裁判，不宜仅援引《公司法解释（三）》相关条文作出裁判。

案例1中，申请执行人仅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请求追加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被执行人。但《变更追加规定》并无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追加实际控制人为被执行人的相关规定。乙公司在诉讼中所列举李某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等情形，均非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法院未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追加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02 追加出资不实股东

❖ **案例2：**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甲公司向赵某返还品牌授权费2000万元、货物储备金250万余元等，该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赵某以出资不实为由申请追加甲公司股东齐某等为被执行人，被法院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判决追加甲公司股东齐某等为被执行人承担相应责任。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齐某向甲公司缴纳全部认缴出资款300万元。

## 一、“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审查适用

《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申请追加公司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条件之一是“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应当既包括**认缴出资期限届满未缴纳**，也包括**认缴出资期限虽未届满但加速到期的情形**。主要理由是，在第十七条已明确可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且《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亦认可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情况下，将加速到期规则排除在变更追加程序之外缺乏充分依据。同时，《九民纪要》规定的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条件之一是“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执行程序中显然更容易判断公司财产是否存在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事实。

《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对于该条中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如何把握，笔者倾向于参照《九民纪要》第六条第一项予以认定。**在符合前述规定的情形下，申请执行人依照《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和《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请求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相应责任的，可予支持。**

关于出资期限加速到期后，股东出资应入库还是个别清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规定，代位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终止。债权人请求追加未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质是行使代位权。因此，**在非因公司解散、破产而加速到期的情形下，申请执行人请求公司股东代位直接清偿债务，有相应法律依据。**

## 二、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向公司补足出资能否对抗申请执行人

实践中，一些股东出于各种考虑，在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过程中，径自向公司补足出资，并以此为由主张免除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公司或其他股东对其有出资请求权，公司债权人对其亦有相应补充赔偿责任请求权。在纠纷进入诉讼前，前述请求权是并存的。股东如果全面履行向公司的出资义务，则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权相应消灭。

但如果股东已被公司债权人起诉追加为被执行人，相应的出资款项偿债对象便已特定化。**在诉讼系属确定的情况下，该股东不得向本案债权人之外的其他主体选择性清偿。**具体清偿顺序，应待生效判决作出后视情而定。

**股东径自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不能免除其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责任。**主要理由有二：其一，股东已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如径自向公司或其他主体清偿，将使申请执行人的请求权落空，有违公平原则，亦扰乱了正常司法秩序。其二，股东径自向公司出资，出资行为的真实性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规避执行等事实难以查明。即便出资款实际进入公司账户，如公司用于清偿其他债务，也可能减损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利益。

案例2中，齐某在二审审理期间，向公司补足出资，并以此为由提出免责抗辩。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司股东被起诉追加为被执行人诉讼过程中，不应直接向公司出资。股东无视其与债权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正处于诉讼特定化过程的事实，径自向公司出资的，有违公平、诚信，对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免除其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的相应责任。

### 三、瑕疵减资可类推适用出资不实规定

《公司法》允许公司减资且不以债权人同意为前提，但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并及时通知债权人、履行公告和通知手续。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未按法定程序通知债权人或披露减资信息的构成瑕疵减资。

瑕疵减资本身不属于《变更追加规定》所列明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在追加被执行人程序中，不宜直接依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应通过法律解释、类推适用等方法对减资股东是否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的法定事由具体分析，进而在追加事由法定的框架内评判应否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从解释论层面考量，股东出资期限已届满或出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加速到期情形的，公司在债务形成后瑕疵减资，免除特定股东认缴出资义务，明显具有逃废出资的主观故意。此类瑕疵减资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与《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出资不实具有相似性，可以类推适用第十七条规定。如果瑕疵减资过程中，股东从公司抽回出资的，可以类推适用《变更追加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抽逃出资情形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 03 追加瑕疵股权转让股东

❖ **案例3：**某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11月23日裁决：甲公司支付乙公司欠款本金及利息、律师服务费2800余万元，丙公司对前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乙公司申请执行，执行机构扣划甲公司银行存款550余万元，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乙公司申请追加甲公司的原股东A、B、C及现股东D公司为被执行人承担相应责任。经审理查明，甲公司2018年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发起股东为丙公司。2022年2月，丙公司将股权先后转让给A、B、C；2022年8月，A、B、C将股权转让给D公司。

#### 一、执行程序中追加原股东的审查要点

1. 《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是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前提条件之一。根据追加事由法定原则，能否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应依据该规定进行审查。《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不属于《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列明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因此，**民事执行中，一般不宜直接追加未届出资期转让股权的原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相应责任。**

2. 《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实际价额显著低于认缴出资额的”，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所列“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在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时，当事人请求依法追加该原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可依法予以支持。**

#### 二、追加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的原股东的例外情形

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转让股权，一般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但**在原股东转让股权时，出资期限已符合加速到期条件或存在恶意转让、逃避出资义务等情形的，可依法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1. 原股东转让股权时已符合加速到期情形的，其违反资本充实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实践中，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审理重点是出资义务是否符合《九民纪要》规定加速到期的情形。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债务人公司进入执行程序，尤其是执行机构已经作出终本裁定的情况下，则债务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相对易于证明。**原股东若抗辩称公司仍有财产可供执行，需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2. 原股东恶意转让股权是在出资期限届满前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出资义务。**恶意转让属于恶意串通的具体表现形式，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而是否存在恶意转让的故意，属于当事人主观意识方面的事实，往往缺少直接证据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应综合公司债务形成时间、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股权转让时间、转让原因、受让人是否支付合理对价、受让人是否明显无出资能力等因素进行全面审查认定。**

**如果原股东以不合理低价将股权转让给明显没有出资能力的受让人，构成恶意转让、滥用股东期限利益的，一般可以认定其有逃避出资故意。**例如，原股东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零元转让给没有固定资产的某轻资产型贸易公司，该公司名下无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及不动产，公司账户基本无资金，近三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纳税金额均为零；或者转让给罹患重疾且无任何偿债能力的高龄老人等。生效裁判均认定原股东系“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出资义务”，并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 三、股权多手转让情形下如何追加被执行人

在股权经过多手转让情形下，**判断能否追加历任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主要标准仍应是其“转让时”出资期限是否届满或存在恶意转让、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

例如，债务人公司股权经甲→乙→丙→丁转让，且截至追加被执行人诉讼时各股东均未实际出资。股东丁是股权最终受让人，同时为现股东，可以依照《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审查是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股东甲、乙、丙转让股权时，如果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则需审查其转让时是否符合前述例外情形。



如果甲、乙、丙在股权转让时出资期限均已届满，则在同时追加该三人和现股东丁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四人所承担责任形式应当如何确定？《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第十九条规定“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两处“依法”所指向的是《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均是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问题是，甲、乙、丙、丁彼此承担的责任之间是何关系？有观点认为该四股东分别对债务人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人的补充赔偿责任彼此构成连带责任。考虑到《民法典》已明确连带责任只能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从避免重复清偿和便于执行角度考虑，判令四人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为宜。

案例3中，原股东A、B、C从丙公司处受让股权，后又转让给现股东D公司。其中A受让股权后已缴纳全部出资，B、C未缴纳出资。一审法院认为，D公司为现股东，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未出资金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A已经实缴出资，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B、C转让股权时案涉债务已经形成，且符合出资期限加速到期情形，故追加B、C为被执行人，在未出资金范围内承担相应补充赔偿责任。B、C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04 追加一人有限公司股东

❖ **案例4：**执行依据判令甲、乙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于2023年3月1日解除，乙公司返还甲公司损失9000余万元。甲公司请求追加债权债务关系产生时的股东王某对乙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查明，乙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甲、乙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于2021年1月，其时王某系乙公司一人股东。王某于2022年10月将全部股权零元转让给丙公司。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其担任股东期间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事实。

##### 一、追加一人股东的举证责任分配

《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变更追加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要件之一是“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由此可见，**在变更追加执行异议之诉中，股东应当承担公司财产独立的举证证明责任。**

2018年修正的《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现行《公司法》已删除该条，取而代之的是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这意味着，在现行《公司法》施行前，如果一人有限公司未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属于违反法定义务，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可认定为财产混同。**如果股东提供经审计的每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可认定为初步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一人有限公司未进行年度审计，仅提供执行异议之诉中单方委托的专项审计报告的，一般不予采信。

**若申请执行人主张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不真实，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反驳。**如果能够公开查询到的债务信息、大额资金流水等没有体现在财务会计报告中，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进行专项审计。如果专项审计认定公司与股东存在财产混同，则股东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九民纪要》第十条列举了认定公司和股东财产混同的考虑因素，包括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财产，不作财务记载；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等。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可以综合审查考量前述因素。

**一人有限公司和股东之间偶尔一次互相转账、代收代付行为，且金额大体相当的，一般不宜仅据此认定存在财产混同。**

## 二、夫妻股东能否类推适用一人股东相关规定

《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只有一个股东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东形式上有两名自然人股东，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本质上应具备股东权利和股东意志的单一性。夫妻股东可依法分别行使股东权利，并非单一民事主体。出资来源与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并不代表夫妻股东的意志具有同一性，不能推导出夫妻股东实质为一人的结论。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夫妻股东，不宜参照《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条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 三、追加债务形成时的一人股东的审查要点

《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此处的“股东”并未限定为现股东。从责任性质上，股东承担的是基于财产混同产生的连带责任，并非仅基于其股东身份而产生，亦不必然因股权转让而消灭。因此，**债务形成时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即使后续已转让股权，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在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的情况下仍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关于债务形成时间的认定，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其一为合同成立并生效时，双方均受合同效力约束；其二为合同生效后，履行期限届满或所附停止条件成就，且债权人如有对待给付义务已恰当履行，此时债权人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其三为针对合同纠纷司法裁判或仲裁裁决生效，此时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具有执行力。笔者倾向于对观点一、二进行综合把握，即**综合合同履行情况，债权人的合理预期、信赖利益及债务人转让原因、转让对价等因素审查确定**。观点三认定标准过于严苛，让债务人易于逃避债务，对债权人保护多有不周。

案例4中，甲、乙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于2021年1月，2022年2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王某于2022年10月转让全部股权，可认定其系债务关系形成时乙公司的一人股东。在王某不能证明其担任股东期间乙公司财产独立的情况下，人民法院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对乙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结语

审理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需要严格把握追加事由法定原则，确保执行债权迅速、经济实现，同时查明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依存性、实体利益归属的一致性，并赋予被追加股东以正当程序保障。

## 对网络刷量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认定

来源：上海高院 发布时间：2025年06月05日 09:03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数据及其所形成的流量，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利益。部分经营主体受利益驱使，通过不正当手段组织网络刷量，甚至形成了专门从事流量造假的黑灰产业链，严重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此，司法裁判应积极发挥规则指引和价值引导作用，对组织刷量的行为依法认定、严厉打击。

本期分享的案例是**一起针对特定社交媒体平台组织实施网络刷量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明确，经营者有偿提供网络刷量服务，损害了经营者利益、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该案件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 北京某公司诉上海某公司、黄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裁判要旨

网络经营者为平台用户有偿提供平台刷量服务，虚构平台中的用户数据，造成相关公众对相应用户的知名度、影响力、受关注程度等产生错误认知，既破坏了平台数据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也影响了消费者对于真实、准确信息的获取，破坏了公平健康的互联网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

#### 关键词

网络刷量 / 流量造假 / 不正当竞争 / 虚假宣传

#### 案例撰写人

胡琛罡

**胡琛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二级法官，曾获评国家版权局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有功个人、上海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嘉奖，主审的案件入选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等，调研成果获评全国知识产权优秀调研成果特等奖、全国法院系统优秀案例分析优秀奖等。

## 01 基本案情

原告北京某公司系“某浪微博”网站、“某浪微博”安卓手机APP的运营主体。“某浪微博”网站上公示有《某服务使用协议》等规范文件，其中明确禁止任何针对微博的刷量行为。

被告上海某公司成立于2020年9月29日，唯一股东为被告黄某。该公司注册并运营涉案“一x粉”“亿x网”等网站，通过这些网站以及黄某的微信号、QQ号、淘宝店铺等宣传推广并向公众提供“某浪微博”的点赞量、阅读量、评论量等的刷量服务。用户购买特定刷量服务后，“某浪微博”上的相关数据均有相应增长。刷量收取的费用由被告黄某个人收取，不进上海某公司的账户。此外，黄某早在2017年10月就在网络上宣传和开展“某浪微博”刷量服务。

**原告北京某公司诉称：**其对用户粉丝量及博文阅读量、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视频播放量等数据及基于数据所产生的衍生性商业价值享有竞争优势和合法权益。两被告通过涉案平台宣传推广和开展针对“某浪微博”的刷量业务，共同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故诉请判令：被告黄某、上海某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0万元。

**被告上海某公司、黄某辩称：**上海某公司与原告的经营范围、经营模式完全不同，不具有竞争关系，两被告实施的刷量代理业务不构成不正当竞争。退一步讲，即便构成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影响也极小，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 02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上海某公司、黄某立即停止对原告北京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二、被告上海某公司、黄某在《法治日报》上发布声明，以消除因其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告北京某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不履行，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本判决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上海某公司和黄某共同承担。三、被告黄某赔偿原告北京某公司经济损失25万元。四、被告上海某公司、黄某共同赔偿原告北京某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五、被告上海某公司、黄某共同赔偿原告北京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15万元。六、驳回原告北京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 03 裁判思路



### 04 案例评析

网络刷量，通常是指以提升特定对象（如商品、服务、个人、视频、文章、公众号等）的热度、影响力或商业信誉为目的，采用技术或人工手段虚增互联网平台中流量表现形式（如关注人数、活跃用户、浏览量、点击率、播放量、评论、转发、点赞等）的行为。

#### 一、网络刷量侵害“三元法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法益，**包括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三元叠加”结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从损害的角度看，“三元法益”受到侵害，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要条件。

#### （一）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利益

网络刷量对其他经营者竞争利益的损害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其本质是通过数据欺诈破坏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在互联网环境下，其他经营者包括了相同或关联行业的同类竞争者、存在业务关系的合作者以及所在平台的运营者等。



**首先，对同类竞争者而言**，刷量行为通过虚假点击等手段虚增自身流量，虚构了造假者竞争优势，制造了“虚假繁荣”现象，误导相关公众认为造假者和/或其商品、服务更受欢迎，从而获取了本不应属于造假者的优势地位。具体可以表现为同类竞争者的经营数据下降、曝光机会减少，在平台算法推荐中排名下降等。

**其次，对业务合作者而言**，网络数据及其所对应的流量，是其选择合作对象的重要依据。网络刷量会误导合作者的商业决策，诱导资本向虚假繁荣的领域集中，导致商业资源错配。此外，在以网络流量作为合作收益结算指标的商业模式下，刷量会给合作者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者而**

**再次，对平台运营言**，一方面，刷量会严重损害平台的公信力。有失客观性的数据指标将导致社会公众对平台信任度的下降，并对平台管理能力产生质疑。久而久之，平台的用户粘性下降，平台在同行业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降低。为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平台运营者不得不耗费额外的成本，对平台上刷量的情况运用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监控与治理。

另一方面，刷量干扰了平台的算法逻辑，也会影响平台本身的运营。在互联网激烈竞争之下，各大平台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产品定位和运营策略的内容选择、孵化、推荐机制，其核心就是不同平台研发的算法，而算法又依赖于真实可信的平台数据。如因造假导致数据失实，则会动摇平台算法的基石，干扰算法反馈的资源配置结果，出现如平台给虚假流量提供广告补贴与流量扶持等情况，影响平台商业模式的有序开展。

## （二）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网络刷量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通常是隐性的，不像侵害竞争利益那样明显，但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却殊为严重。

第一，**刷量最直接的危害在于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在网络环境中，消费者往往无法直接接触并了解商品或服务的物理特性，其他用户的评分、评价等数据就会成为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参考，这些数据也是网络消费较之线下消费的优势所在。然而在刷量等造假行为的干扰下，消费者无从知晓相关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

第二，**刷量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由于造假行为所带来的高流量具有强引导性，消费者将被迫接受本不应被推荐的内容、本不是热点的信息等受到“污染”的信息，进而使得消费者无法作出符合自身意愿的决策，选择权形同虚设。



此外，网络刷量还容易引发隐私泄露与数据安全风险问题，侵害消费者的隐私权等人格权益。

### （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立法目的，也是其与侵权法的区别所在。网络刷量对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刷量者通过虚假流量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使诚实守信的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真正优质的内容或产品被虚假流量湮没。为应对这种情况，原本诚信经营的市场主体可能不得不加入流量造假的行列，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循环。

**二是干扰市场资源配置。**虚假流量误导资本流向，导致资金流入低质量商品、服务或内容，造成资源错配。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虚假的流量数据还可能会误导公共决策，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导致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影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侵蚀社会诚信体系。**刷量行为的本质是有违诚信的欺诈行为，不仅会破坏单一平台的信任机制，还可能降低公众对网络信息的整体信任度，损害互联网生态信用体系。

**四是催生黑灰产业链条。**刷量涉及技术开发、账号买卖、数据伪造等多个环节，其背后往往伴随着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虚拟账户注册”“空包物流”等配套黑灰产业，形成跨平台、跨地域的犯罪网络，威胁公共安全。

**五是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由于刷量行为具有隐蔽性和扩散性的特点，平台与监管部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维护、监测和打击，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防止虚假流量对平台生态以及整个网络生态体系的破坏。

## 二、网络刷量的民事法律规制

刷量行为因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三元法益”，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首先，从行为效力来看，刷量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应地，因造假而虚增的流量亦无效。同时，根据“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原则，**对于刷量产生的不法利益，应当不予认定或依法追缴**。

其次，从损害结果来看，前已分析，网络刷量同时侵害“三元法益”。针对不同的侵害对象，造假者所需承担的民事责任也有所差别。

**对其他经营者而言，刷量行为通常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人为美化自身网络数据，自行或是委托第三方提升自己内容的关注数、浏览量或商品销售量等数据，属于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宣传。受托实施刷量的行为人，则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消费者而言，刷量行为侵害了知情权、选择权以及人格利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然而，由于刷量的损害具有非显著性的特点，消费者往往难以证明其权益受损，加之维权成本高昂，消费者难以独自有效应对。此时，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给予整体保护。

### 05 法条链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最高检抗诉！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再审案获改判**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时间：2025年06月04日 09:47

近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备受关注的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抗诉案迎来终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判令胡某生等3人作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在未尽催缴义务的过错范围内，对公司损失的10%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他3人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原再审生效判决中，胡某生等上述6名董事均须对公司全部损失——股东欠缴的近500万美元出资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法再审判决显示，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肇始于2015年1月。因商业环境发生变化，斯曼特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破产清算时，破产管理人注意到公司股东仍欠缴近5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于是以公司名义，就上述欠缴出资向胡某生等6名董事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历经一审、二审之后，案件进入再审程序。2019年6月28日，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认定胡某生等6名董事因未能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应对股东欠缴的近500万美元出资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胡某生等6名董事不服上述生效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

最高检受理该案后，于2021年3月29日举行公开听证会。历经多次调查核实、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和最高检检委会讨论决定，最高检以“公司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义务的性质相适应，再审判决判令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案件就此进入第二次再审程序。最高法开庭审理，最高检院领导出庭，依法发表抗诉意见。之后，最高检院领导列席最高法审委会会议。今年1月，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胡某生等3名董事就公司10%的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再审判决认定的赔偿责任不是连带责任，而是与其过错相当的、违反勤勉义务的相应责任。”最高检办案人表示，董事的催缴义务与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不同，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不等同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办案组积极践行“三个善于”理念要求，注重行使调查核实权，对董事勤勉义务进行符合立法原意的考量——董事责任应与其过错程度相当。尽管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是在公司法修订之前，但监督要义也完全符合新修订公司法有关规定。在新修订公司法施行即将满一年之际，该案的成功办理是检察机关保障公司法统一正确实施的生动实践。

### 公司董事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义务，该不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解读最高检抗诉办案始末——为何要抗？何以成功？

“能否从巨额的连带责任中‘择’出来？”案件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后，胡某生等6名董事看到了希望，但又不敢肯定。在法律当时并未明确责任类型和责任范围的前提下，遵从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似乎理所当然。而这，又明显与自己的公正观存在差距——

“一定要冒着被解雇的职业风险，确保股东出资到位，才算是履行了董事义务吗？若不如是，就要承担股东出资不实的连带责任？”这个不解，不仅来自胡某生等6名董事。基于对原再审判决“未履行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董事要为股东出资不实连带担责”的裁判思路，上述案件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公共话题：“股东是委托人、董事是受托人，在‘上级’明确表态不再出资的前提下，董事依然要催缴出资并为此承担连带责任，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案件会怎么审？检察机关能否抗诉成功？这不仅影响着公司治理的实践操作，也是对公司法统一正确施行的司法考验。

202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判决胡某生等3名董事（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对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斯曼特公司”）损失的10%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驳回斯曼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检民事检察研究基地主任、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单平基表示，最高检提出抗诉虽然在公司法修订之前，但抗诉意见与公司法的修订内容高度统一，这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在“三个善于”理念的指引下，对公司法原理以及公司治理机构的深刻把握。

在公司法修订之前就做到了抗诉意见与公司法修订精神高度一致，这种“预判”是巧合，还是特定方法路径指引下的必然？抗诉意见被最高法完全采纳的背后，是怎样的民事检察履职？带着这些关注，记者展开了采访。

### “过山车”——从无责任到连带责任

尽管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之间纠纷的原再审判决早在2019年就已作出，但与判决相关的讨论和分析从未停止过。

“特别是律师等实务工作者，努力从实务指引的视角解读原生效判决，从而为董事履职提供参考借鉴。”北京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璐璐认为，尽管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一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签发的生效判决，其对公司治理实务的影响不容小觑。

“要从判决中寻求董事充分履职的路径，防止成为连带责任的‘背锅侠’。”郭璐璐说。

这是一起怎样的纠纷？

案件的当事人之一——斯曼特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5年1月11日的外国法人单独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开曼斯曼特公司。

“开曼斯曼特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1600万美元，公司成立后90天内股东应缴付出资300万美元，第一次出资后一年内应缴付出资1300万美元……”在斯曼特公司的章程中，记者注意到上述约定。

2005年3月至11月，开曼斯曼特公司多次出资后，仍有500多万美元的注册资本尚未缴纳。究其原因，是全球彩电市场从2004年年底开始就从显像管时代迈进了平板时代，如果在显像管领域继续投入，势必导致巨额经济损失。作为斯曼特公司最重要的供货商，捷普公司无疑受到这一商业决策的最直接影响，资金链的断裂导致货款无法得到及时清偿。提起诉讼后，捷普公司仍不能得到全部清偿，因此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

2013年6月3日，深圳市中级法院裁定受理，并指定广东某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2015年1月20日，破产管理人代表斯曼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胡某生等6名斯曼特公司的董事对公司股东欠缴出资所造成的公司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胡某生等6名董事负有追缴股东欠缴出资的勤勉义务，但消极未履行追缴出资的勤勉义务与股东欠缴出资不存在必然联系，也与公司损失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要求董事对股东未履行全面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上述考虑，一审、二审法院驳回了斯曼特公司的诉讼请求。

进入再审程序后，案件发生“过山车”式的变化。最高法认为，股东欠缴的出资即为斯曼特公司遭受的损失，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胡某生等6名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

“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胡某生等6名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胡某生等6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据此，最高法认定，一审、二审判决认为胡某生等6名董事消极不作为与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基于上述理由，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判定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胡某生等6名董事不服这一再审结果，向最高检申请监督。

### 谁来催缴出资？催缴不力又该如何担责？

对于胡某生等人的“不服”并不难理解。

“在现代公司法理论上，股东是委托人，而董事、经理是受托人，世界各国公司法都赋予了股东选举和罢免董事的权利，以此来监督和制约董事的权力。在这种构造下，要求作为被监督者的董事去监督作为监督者的股东，让‘下级’去监督‘上级’，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其效果可想而知。”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邹学庚曾就本案专门写过分析文章。

“一是催缴出资是否属于董事的勤勉义务范围；二是董事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是如何确定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董事的责任范围。”在初步了解本案的诉讼进程后，最高检办案组确定了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开展调查核实的工作思路。

为了更好地掌握案件情况，2021年3月29日上午9时30分，最高检组织召开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申请监督一案的公开听证会，围绕斯曼特公司成立过程等问题，组织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历时3个半小时，相关事实逐渐清晰。



“6名董事中，有3名董事是在股东作出不再继续出资的决策后才担任公司董事的，即便积极履行催缴义务，也不存在显著的催缴效果，补缴出资缺乏现实基础，如此，怎么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呢？”全面把握事实后，如何认定法律适用就成了监督办案的重点。

于今日，依据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公司法来看，上述问题不难有答案：新增的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董事会应履行对股东出资情况的核查和催缴义务，未及时履行上述规定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在当时，由于立法空白，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规定了董事在增资阶段应履行对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但对于违反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以及催缴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在学界看来，催缴义务是勤勉义务的内容之一。对于勤勉义务，各国公司法都有规定，普遍表述为“董事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来处理公司事务”。但现代经济活动十分复杂，对于董事在经营决策时是否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

“董事在增资阶段的催缴义务，能否扩展至公司设立之时？”“董事催缴义务与股东出资义务有何不同？违反上述的各自义务，董事与股东是否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董事要为股东连带担责？”解决这些问题成了监督办案的关键。

“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形成的唯一来源，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对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至关重要，督促、催缴出资是董事履行勤勉义务的重要内容。”在最高检办案组成员颜良伟看来，明确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并不意味着不履行该义务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董事的催缴义务与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不同，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义务的性质相适应，不能等同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也不能将股东责任转嫁给董事，以董事的责任替代股东责任，不可混淆二者义务的性质和责任范围。”颜良伟表示，增资阶段和公司设立阶段，董事的勤勉义务有所不同。将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相应责任”理解为“连带责任”，属于扩张解释。



“连带责任在实践中的司法适用需要慎重把握。只有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方可设置连带责任。虽然董事负有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但其消极不作为行为，对出资不到位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影响力有限，不宜认定为连带责任。董事没有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应该是一种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责任，理应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颜良伟说，“如果在民事检察办案中遇到法律适用方面的难题——立法空白或者法条适用之间的冲突，此种情况就要依据‘三个善于’的理念要求，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深刻领悟法治精神，从而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比如，基于法律安定性和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的要求，在个案中适用司法解释就应该以文义解释为准，不宜作扩张性解释。”

### 为董事“松绑” 公司法修订精神的践行

最高检检委会研究认为，再审判决判令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于是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诉。

案件就此进入第二次再审程序。最高法开庭审理，最高检院领导出庭，依法发表抗诉意见。之后最高检院领导列席最高法审委会会议。2025年1月6日，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判决胡某生等3名董事（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对斯曼特公司损失的10%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驳回斯曼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其实，不仅案件承办人、案涉当事人关注着本案的诉讼进程，法律实务界也一直高度关注。

有业内人士撰文表示，再审判令董事对欠缴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实属董事不能承受之重；也有法律专家指出，“斯曼特案”的（原再审）判决结果不具有普适性，在个案具体情况差别较大的情况下，不应当盲目适用该案的判决观点，“应对最高检抗诉进程保持密切关注”。

伴随着最高法第二次再审判决的法槌敲响，围绕着上述纠纷的实务与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

“尽管该案原生效判决是在新修订公司法之前作出，但该案能否纠正，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公司法秩序的评价。”郭璐璐说，作为一个再审生效判决，如果不被撤销，其对当事人之间仍然产生着约束效力，对于后来的司法审判，也会产生影响。“如果其他案件，法官援引这个判决，怎么办？新修订的公司法也就无法得到正确实施。”

“通过检察机关抗诉，界定了董事勤勉义务内容和责任方式，这对优化公司治理机构，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鼓励董事履职尽责发挥了积极的司法导向作用。”单平基表示，“公司法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要让身居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才能形成健全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唯有如此，‘弘扬企业家精神’才能有制度根基。这个案例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谈及成功抗诉的原因，在最高检民事检察厅负责人看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对调查核实权的重视，厘清了案件基本事实，为法律适用打好了证据基础，做到了对案件事实的准确把握；二是对“三个善于”理念的落实。

“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之所以能够契合公司法修订要求，与立法精神不谋而合，关键在于贯彻了‘三个善于’理念要求，即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该负责人表示。

“尽管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案例在推动法治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经由最高检抗诉、最高法作出的再审判决，代表着司法机关在规则适用方面的共识，体现了对公司法秩序的尊重。”郭璐璐说。

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长河中，于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已经走过了30余个年头，2023年的再次全面修订，让这部三十而立的法律再次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也推动了公司法治体系的与时俱进。

铅字条文的变化，见证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的立法探索，而把无声法条转化为鲜活的正确公司法实践，恰是体现法律修订“良苦用心”的最佳路径。从本案来看，立法与司法的默契并不是奢望，良法善治的美好愿景正在徐徐展开。

### 普法小贴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第五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专家点评 抗诉的价值与法律的公正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扭转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再审判决，最终令其中3名负有过错的董事在适当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其余董事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其价值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确保了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原再审判决认定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出资行为系共同侵权，以此判令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检经审查指出，原再审判决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将董事未尽勤勉义务时间从“增资阶段”扩张到“设立阶段”，责任从“相应责任”扩张到“连带责任”，属于对司法解释的过度扩张。在公司设立阶段，董事未参与出资决策，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直接认定，不应类推适用该条款。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未及时履行对股东的催缴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承担相应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二是实现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审判决机械适用“连带责任”规则，要求董事对股东欠缴出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质是将股东出资义务与董事勤勉义务混为一谈。最高检抗诉后，法院以“过错责任”为核心重构裁判逻辑。通过抗诉，法院也明确了董事责任不同于股东出资义务，其本质是因违反勤勉义务的过错赔偿责任，而非法定或约定的连带清偿责任。通过审查董事履职期间的客观条件，将“有能力催缴而未作为”与“无能力催缴的合理不作为”严格区分。前者因存在主观过错需担责，后者因缺乏因果关系而免责，践行了“责任与过错相匹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

**三是维护了司法裁判的公正性。**通过抗诉使原审判决得以纠正，明确了董事在股东有出资能力时的催缴义务，倒逼董事积极履职，保障公司资本充实，维护债权人利益。与此同时，否定“连坐式”追责，避免因个别股东失信行为过度加重“董监高”的正常履职风险，防止对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抗诉，强化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感，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助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共识。